

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

徐 康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历史研究部,重庆 400043)

摘要:媒体在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传统媒体充分利用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挖掘热点新闻——大屠杀惨案,为红岩艺术作品提供展示平台,记录并参与红岩文化活动,引导广大读者认知红岩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网络媒体积极创建传播红岩文化的电子景观,集聚丰富的红岩文化信息资源,构建红岩文化的交流空间,开展互动体验活动,释放其文化传播的巨大能量。红岩文化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媒体传播有力地推动了红岩文化的发展,影响和重塑受众的观念世界,增强了红岩文化发展的活力。

关键词:红岩文化;传统媒体;网络媒体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1-0127-08

“当代媒介文化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1]。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发挥媒体对主流文化的传播作用,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中,媒体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媒体是红岩文化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媒体传播扩大了红岩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使其话语符号可以在广阔的空间里,以更大的数量、更高的强度和更快的速度运动,增强了社会文化生活中红岩话语符号的密度。红岩文化发展与媒体传播关系密切,一方面,媒体传播对红岩文化的发展具有塑造与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传播红岩文化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红岩文化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0年来,红岩文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媒体建构的这个“场域”,营造了浓郁的红岩文化氛围,影响和重塑受众的观念世界,有力地推动了红岩文化发展。

一、红岩文化与传统媒体

(一)挖掘热点新闻:大屠杀惨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人们对与胜利几乎同时发生的二百多个革命者被屠杀的惨痛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讲述活动”^[2]。在这次讲述活动中,报纸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大屠杀惨案迅速公之于众。在刚刚解放的重庆,“11·27”大屠杀惨案^①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

收稿日期:2010-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红岩文化发展研究”(07XSH013)

作者简介:徐康(1973-),女,四川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历史研究部文博馆员,硕士,主要从事红岩文化研究。

^①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共有207人遇难。学界对“一一·二七”大屠杀惨案的界定,并不仅仅局限于11月27日这一天,而是泛指国民党军统局在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所进行的系列大屠杀,遇难者主要集中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的集体大屠杀中。被评定为“一一·二七”烈士的,包括被关押于军统重庆集中营最终遇害的,以及在重庆解放前夕为保护兵工厂、电力厂而殉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共285人。戚雷的文章《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历年死难人数考》载于《红岩春秋》1989年增刊,文章对“一一·二七”大屠杀惨案殉难者人数进行了统计:“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在总计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

等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重庆报纸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为了让广大民众知晓大屠杀惨案的真相,来自国内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在大屠杀现场收集信息,走访脱险志士、殉难者家属、集中营附近居民及其他知情者,发回一系列揭露大屠杀暴行的新闻信息,全程追踪报道遇难者遗体发掘工作进展,及时公布遇难者名单,关注社会各界举行的纪念大屠杀遇难者活动动态。许多脱险或获释革命志士在报纸上发表回忆录式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集中营的革命斗争及大屠杀惨案,他们试图把真相告诉读者。这些信息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成为日后人们了解重庆大屠杀惨案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在重庆刚刚解放时见诸报纸媒体的有关大屠杀的书写材料具有文献价值。

1949年12月1日,《国民公报》和《新民报晚刊》第一版分别发表题为《蒋军溃退前夕大肆惨杀“政治犯”》和《国特屠杀爱国份子》的新闻。虽然这两则简短的新闻对于大屠杀惨案的报道并不完整,但这是记者11月30日从大屠杀现场采集的信息,此时距最后一次大屠杀(11月29日)仅仅相隔一天,是新闻界对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系列大屠杀惨案最早的公开报道。这两则新闻就像两枚重磅“炸弹”,立刻在山城重庆引起了轰动。随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日刊》、《新蜀报》、《商务日报》等报纸连续不断地在重要版面,从不同角度追踪报道这个灼人眼球的新闻。

报纸成为当时广大民众获知大屠杀信息的主要渠道,报纸媒体关于大屠杀惨案的深度报道对社会情绪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国特屠杀“政治犯”惨案》^[3]、《国民党匪帮大屠场尸横遍野令人发指》^[4]、《吊“政治犯”屠场》^[5]、《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6]、《“一一·二七”大屠杀数百志士死在匪帮毒手》^[7]等新闻信息,以及《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磁器口大屠杀》^[8]、《逃出白公馆》^[9]、《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10]等脱险者的回忆录式的文章,在读者眼前展开了1949年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的惨不忍睹的一幕。大屠杀暴行激发了民众强烈的阶级情感和阶级仇恨,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崇高革命气节,震撼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报纸不仅详尽地报道了惨案真相,并纷纷发表《敬悼死难的爱国“政治犯”》^[11]、《磁器口大血案》^[12]、《血债要用血还》^[13]、《化悲痛为力量》^[14]等社论,引导和影响读者的思想和行为^②。今天看来这些社论的口号式语言也许显得过多,缺乏对时局和

事件的深刻分析和客观评价,声讨有余而感召力不足,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就不难理解它们营造的“意见环境”在当时所产生的强大效果。在刚刚解放的重庆,特别需要有一股力量能将广大民众团结在一起,在各报上反复出现的集中营大屠杀信息,披露了国民党政府惨绝人寰的暴行,为新政权建立了道德制高点,从道德上否定了旧政权的法统。与此同时,社论喊出的“化悲痛为力量”、“血债必须偿还”、“肃清国民党特务”等口号,也就具有绝对的号召力,引导民众迅速作出符合政治社会需要的反应,激起民众强烈的阶级情感,激励他们彻底与旧政权划清界线并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二)为红岩艺术作品提供展示平台

媒体为红岩艺术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报纸媒体在简单的平面模板上,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岩艺术作品;广播媒体充分发挥听觉形象的魅力,以丰富生动的语言感染听众;电视媒体凭借生动鲜活的画面,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情感真挚丰富,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唤起了读者及观众对红岩文化的思考。

以红岩历史为题材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是报纸副刊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内容。1962年,小说《红岩》在各大报纸副刊栏目连载,不仅充分满足了买不到小说的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也为这一年的报纸副刊集聚了相当不错的人气。20世纪60年代的“《红岩》热”时期和新时期以来,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红岩艺术作品,既有复制性作品,也有原创性作品,它们得到广泛流传,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提到红岩艺术作品,大多数人认为始于小说《红岩》,往往忽略了在重庆解放之初见诸报端的,对重庆市民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红岩艺术作品。

早在1949年12月,红岩艺术作品就与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人们刚从黑暗中走来,忽闻国民党在黎明前夜制造的大屠杀惨案,悲痛和愤怒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们将满腔的悲愤凝聚在笔尖,抒写对这群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革命者的深切怀念。在重庆的诗人和作家们纷纷撰写诗歌和散文纪念倒在黎明前的革命战士,山莓《那歌声还在燃烧》、杨禾《供奉》、艾芜《悼死难的烈士》、邵子南《会师——为纪念李青林同志而作》、邓均吾《献给磁器口死难烈士》、顾工《安息吧!被难的战友》等相继出现在报纸副刊上的诗歌

^②1950年1月15日《大公报》副刊《新文艺》第五期,以“编者”的名义发表文章《我们的悼念》:“一一·二七的暴行……震惊了整个城市……悲痛和仇恨都像那万顷波涛,汹涌而没有止息。我们再一次告诫自己,在这条光荣的战线上,我们的笔应该指向哪里,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作些什么工作,我们的努力是不是足够。只有这样,对于死去的和活着的,才有意义!”

和散文意味深长、耐人咀嚼。“在血污和乱草的上面,在断垣和灰烬的中间,有钢铁的声音火焰般的上升,……轰响啊!轰响啊!驰过祖国十一月的天空。然后枪声将歌声埋葬了。不!那歌声还在燃烧……”^[15]。从集中营的断垣残壁中传来的钢铁般的声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使诗人感受到燃烧的革命激情和生命热力。“在死难烈士的中间经过,这束野杜鹃向哪个的棺木边安插?从一个至善的心愿里上升到庄严的死亡,历史的天幕添上他们辉煌的星座”^[16]。诗人庄严地“捧着崇高的纪念”,“在千万人自由的欢呼声里”^[17],仿佛看见烈士们的身影化作了最美的血色杜鹃。“我脱下军帽,哀痛地站在,被难战友的灵前。那时候,从魔窟(中美合作社)中,伸出的魔手,在各处晃动。母亲忽然不见了孩子,学生忽然不见了先生,读者忽然不见了编辑……爱生存的孩子,爱光明的先生,爱真理的编辑,爱祖国的军人,爱人类的共产党员,被魔鬼们,从老虎凳上拉下来,填进泥坑”^[18]。“魔窟”与“光明”、“真理”、“祖国”等意象形成鲜明对照,倾泻了诗人对大屠杀施暴者的愤慨之情,浸透着诗人对牺牲战友深沉浓烈的情感。1950年1月15日,刊登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长诗《会师——为纪念李青林同志而作》,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长诗作者邵子南是名闻解放区的军旅作家,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李青林是他的未婚妻。重庆解放,邵子南随解放军部队抵重庆,却得到李青林牺牲的消息,他在悲愤交加中写下这首长诗。《会师》发表后,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烈士与诗人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公报》副刊《星期画刊》第一期,刊登了漫画家汪子美的作品《招魂曲》。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红岩美术作品。这组漫画共有六幅图,前三幅以踏入“地狱”、在黑暗中歌唱、在烈火中永生为主题,描绘了革命者的狱中斗争及为捍卫理想信念而献身的悲壮场面,传神地展示了身陷囹圄的革命者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遗憾的是,这幅曾产生过轰动影响的漫画,今天的人们却只能在布满灰尘的旧报纸中找到它的踪迹。这些作品,既有今天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也有鲜为今人所知的。它们给予了当时的重庆读者无穷的精神力量,它们在红岩文

化传播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JP2 报纸的发行量是有限的,红岩艺术作品的传播范围因之受到影响。广播和电视媒体扩大了红岩艺术作品的覆盖面,为受众展示了更加生动逼真的艺术作品。20世纪60年代,各省级广播电台纷纷连播小说《红岩》的精彩内容,积极参与到小说《红岩》掀起的阅读热潮中。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广播评书《红岩》(李鑫荃)、《劫刑车》(李润杰)、《双枪老太婆》(刘兰芳)、《烈火中永生》(袁阔成)、《红岩魂》(袁阔成)等作品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963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第一部连续性广播剧《红岩》,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反响。199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新录制了袁阔成播讲的评书《红岩魂》,这个为中国听众所熟悉的英雄故事魅力依旧。1980年以后,电视机在中国得到普及,电视媒体成为主流媒体。电视台播放的《烈火中永生》、《红岩》、《重庆谈判》、《周恩来在重庆》、《江姐》等红岩影视作品及其它讲述红岩文化的电视专题节目获得了较高收视率。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境内外电视媒体制作的《俗说红岩》^③、《红岩魂》^④、《黎明前的报告》^⑤、《红岩档案解密:罗广斌的报告》^⑥、《红岩八条“碑记”》^⑦、《故事中国:厉华说红岩》^⑧、《歌乐山下的暗战:渣滓洞与白公馆纪事》^⑨等专题节目播出后,产生了较大影响。电视专题片既重史实性,又不失艺术魅力,一幅幅黑白历史照片重现红岩英雄们的风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散发出红岩英雄们的革命气息,一段段具有史料价值的采访声像资料叙述了红岩英雄们精彩而短暂的人生历程,生动的画面填满了观众的记忆空间。观众们徜徉于电视媒体建构的红岩艺术长廊,聆听历史的声音,领略美丽的生命绝唱,折服于英雄们的豁达、不屈和忧天下的情怀。

(三)记录并参与红岩文化活动

红岩文化发展经历了60年的历程,掀起的红岩文化活动深受新闻媒体的关注。这种关注固然是媒体对红岩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的政治敏感使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红岩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吸引

③1996年北京电视台摄制。

④1999年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与红岩联线联合摄制。

⑤1999年重庆电视台摄制。

⑥2006年中央电视台《360度》栏目组摄制。

⑦2008年山东电视台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联合摄制。

⑧2009年重庆卫视播出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摄制的电视专题节目。

⑨2009年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组摄制。

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闻媒体不仅完整地记录了红岩文化活动的轨迹,还积极参与其中,为弘扬红岩文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新闻媒体记录了红岩文化活动的动态,让受众感受到浓厚的红岩文化氛围,使红岩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解放初期的纪念大屠杀殉难者的追悼会、送灵游行、展览会、座谈会、报告会等系列活动,到20世纪60年代的“《红岩》热”,20世纪90年代巡展“红岩魂”引发的“红岩魂现象”,2000年形象报告展演《红岩魂》震撼人心的艺术效应,每一次红岩文化活动,都在新闻媒体的板块上留下了生动的话语符号,吸引公众的关注与参与。20世纪62年,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级党报、广播电台以专版、专栏等重点报道的形式,连篇累牍地记录了小说《红岩》掀起的阅读热潮,为“《红岩》热”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金秋,展览“红岩魂”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展,产生轰动效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在头版报道了此次展览的盛况。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黄金栏目也以大篇幅进行重点报道。“红岩魂”进入了主流媒体和强势媒体,在传媒的黄金时段和重要版位唱起了主角。媒体使广大民众知晓了这场在京城掀起的“红岩风”,媒体频繁出现的“轰动”、“火爆”、“震撼”等关键词所营造的“意见环境”,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产生了强大的效果:风闻而来的26张邀请函把“红岩魂”请到了26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完整地记录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红岩文化活动,这种以记录的形式进行的传播,为红岩文化活动插上了翅膀,使其迅速传遍城市与乡村。

媒体充分利用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积极参与红岩文化传播活动,展示红岩文化的丰富内涵,引导广大读者认知红岩文化的意义和价值。1950年1月15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将重庆解放初期掀起的纪念大屠杀殉难者的活动推向高潮。15日、16日两天,重庆各大报纸纷纷发表纪念特刊,登载烈士传略、回忆录文章和纪念文章等,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让读者了解历史,认识这群为共和国献身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全国掀起“读《红岩》”、“学《红岩》”、“演《红岩》”的活动热潮,报纸和广播媒体利用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优势,发起评《红岩》活动,成为“《红岩》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评论文章《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1962年第3期《文艺报》以《〈红

岩〉五人谈》作总题发表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的评论文章。文学界权威专家对《红岩》是“正气歌”和“教科书”^[19]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红岩》的‘意义’和‘思想高度’,使得《红岩》的出版成为1962年初引人关注的事情,对于其它新闻媒体的及时跟进也起到了示范作用”^[20]。随后《中国青年报》的“红岩精神赞”、《新华日报》的“我读《红岩》”、《浙江日报》的“红岩风格赞”、《云南日报》的“《红岩》人物专栏”、《重庆日报》的“笔谈《红岩》”等专栏,及其他报纸和文学评论刊物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红岩》的评论文章,普遍认为“《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21]。1962年7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暑期青年修养专题讲演,专题“向《红岩》的英雄们学习什么”^[22]在青年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1963年11月,中央、四川及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播出红岩英烈“小萝卜头”的二姐宋振苏的讲话录音《读〈红岩〉忆亲人》,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多次重播^[23]。报纸媒体关于小说《红岩》的解读,以及广播媒体组织的相关专题讨论和讲话录音,明确地表达了媒体参与这场席卷全国的“《红岩》热”活动的态度,媒体的“文化参与”引导读者对《红岩》文本进行“倾向性阅读”^[20]。

二、红岩文化与网络媒体

(一) 集聚丰富的红岩文化信息资源

网络媒体可以汇聚所有媒介的信息,展示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信息,为受众提供一个不断“膨胀”的信息空间。“时间上可即时、随时播报,可长期使用,一经上网可随时查阅;空间上,容量无限大,可以覆盖全球”^[24]。这是一个能够快捷获取信息的电子通道。受众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网上查阅有关红岩文化的电子书籍、电子报刊等资料,观看各类红岩影视戏曲节目,获取有关红岩文化活动的新闻信息等。2010年5月26日,新浪、搜狐、网易、百度等全国42家网络媒体共同签署了《红岩宣言》,主题是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标志着互联网日益成为红岩文化传播及其发展的重要载体。当然,网络传播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评价标准受到挑战。因此,对网络传播要合理引导,使其在文化传播中释放更大能量。

主题网站、论坛和博客是进行红岩文化传播的主要网络形态。互联网上不仅有红岩联线、红色春秋等官方建立的传播和弘扬红岩文化的主题网站,还有红岩英烈网上纪念馆、烈火红岩主题论坛、烈火红岩播客、红岩吧、江姐吧等民间网站。它们利用网络的技术优势,通过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链接功能大量复制红岩文化信息,普及红岩文化历史知识,开

展丰富的网上文化活动,吸引了许多青年网民,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成为引人注目的网络平台。红岩联线网站的前身是不朽的红岩网站,始建于2002年,2007年完成整体改版。该网站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开设的红岩主题网站,其中的“红岩精神”、“历史研究”、“红岩掌故”、“红色之旅”、“红岩丛书”、“影音在线”等精品栏目,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在红岩历史研究、红岩革命文物展示、红岩艺术作品展播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传播红岩文化的网络主阵地。红色春秋网站建于2009年,开设的“红岩之光”、“南方局纪事”、“红岩春秋”等专栏,解读红岩文化历史,引导受众认识和理解红岩文化。民间红岩主题网站和其他综合性网站也发布了大量红岩文化信息,与官方的红岩主题网站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传播红岩文化的电子景观。据笔者统计,2010年5月12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红岩”,数据支持953万条;2010年8月12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出现有关“红岩”的数据支持1220万条。仅三个月,百度搜索引擎就增加了267万条关于“红岩”的信息,网络空间“红岩”信息的快速膨胀,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红岩”是网络媒体传播的一个热点。网络所承载的红岩文化信息量,是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网络媒体为红岩文化提供了巨大的传播展示空间。

(二) 构建红岩文化的交流空间

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实现了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的转变,解构了以往横亘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沟通、对话和交流中实现文化传播,是网络媒体不可替代的特点,对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和平台。人们坐在电脑桌前,敲下自己的踪迹,与公众进行对话和交流。红岩联线网站的网友互动平台、网上红岩英烈纪念馆的网友讨论区、博客们设置的红岩专题留言板,以及烈火红岩主题论坛为网友提供的对话、交流空间,使网友们可以在这里“喊出”自己的声音,探讨对红岩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网络建构的红岩文化交流空间,拉近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距离,使红岩英烈家属、红岩文化研究学者以及对红岩文化有特殊感情的受众群体之间,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平等自由地对话和交流,不仅增强了红岩文化传播的亲力和感染力,也促使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更深入。

烈火红岩主题论坛成立于2006年4月,开设了“《红岩》往事”、“《红岩》感怀”、“《红岩》书写”和“《红岩》改编”等栏目。红岩情结使烈火红岩主题

论坛的网友们聚在这个穿越时空界限的空间,写下或质朴真挚,或激情飞扬的文字,抒发对红岩英雄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该论坛对红岩历史、红岩艺术作品、红岩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等进行了讨论,其中的许多话题显示了网友们较深的红岩历史积淀和较强的文化思辨能力。比如该论坛曾针对小说《红岩》塑造英雄的独特叙事视角,通过意志考验来表现英雄们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探讨过这样一个话题:“组织要求成员在任何酷刑之下都保守秘密,是否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26]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烈火红岩主题论坛引导网友们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探讨英雄与叛徒的区别,点击率极高。人道主义的特点是以人为本,而酷刑则意味着对人的身体的摧残和伤害。虽然网友们的讨论层面深浅不一,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为了保全个人而出卖同志,致使更多的人被捕牺牲,这种超出道德底线、违背组织原则的行为才是不人道的;红岩英烈们面对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死亡从容不迫,他们战胜和超越了世俗社会和平凡人生无法战胜和超越的挑战,体现了人性的崇高感,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无独有偶,在2002年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举办的“探索者之夜”之重读《红岩》的教学实践活动中,虽然大多数学生认同小说塑造的英雄群像,但也有部分学生对小说文本展示的英雄主义不以为然。有的学生认为“《红岩》中的英雄是一群欲望被压抑的英雄”,是“一群无用的英雄”,“《红岩》的英雄的完美却没有体现出美来”^[26]。有的学生甚至认为《红岩》是一个反人性、反现代性的乌托邦,塑造的是一群被阉割了爱与生的所有欲望和能力的英雄。一位学生在读后感中这样评价《红岩》英雄人物:“当他们满怀‘对革命的热情’时,我发现,英雄生命被扭曲和单一化的悲哀:他们缺少‘对生命的热情’!……而没有了生命的热情,也就没有了欢乐和痛苦,更没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理由和意义!”^[27]其实《红岩》的难能可贵,恰恰在于它将审美视点投向了英雄群雕的人性光辉,体现了人性的壮美和崇高。部分“80后”之所以对《红岩》产生不恰当的误读,究其原因,是出现了文化断层。他们缺乏历史记忆,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在他们的文化认知中,崇高被粗暴地否定,游移于人性之外。这种文化认知的盲点,在当今的消费时代青年人中不乏少数。因此,网友们(其中不乏“80、90后”,以及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这个非官方的论坛交流中,对红岩英雄们生存价值观的一致认同就显得尤其难得。当然,这个论坛交流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对其他参与讨论者的认

知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略的,促使网友们在相互讨论中对红岩英雄们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在红岩论坛上敲下的肺腑之言影响了相当数量的网民,甚至使部分对红岩文化存在偏见的网民,改变了过去的肤浅认识。“网络媒体由于能够激发很多针锋相对的讨论和探讨,在共时的、直接的交流交锋中间,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得以深化,使得人们的文化意识在沟通和交流中间获得一种相互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27]。

(三)在虚拟空间“重现”现实环境

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适应了受众日益增长的参与性、互动性体验要求。网络祭奠和网络展览模拟现实场景,为受众提供“实地”参观和祭奠的场所,让人有如身临其境。在网上构建“重现”现实环境的虚拟空间的技术被逐渐运用到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播中,扩大了“参观”群体。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3D、4D等高新技术将会在革命历史文化的传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红岩联线网站设制了网上祭扫平台,在网络纪念系统“网同”上注册的红岩英烈纪念馆、江姐及彭咏梧烈士纪念馆、陈然纪念馆等12个民间网上纪念馆也纷纷开设网上祭奠活动,设制模拟现实场景的虚拟空间,营造肃穆的气氛,为网友们提供纪念红岩英烈的网络平台。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对红岩英烈表示敬意和怀念,可以在红岩英烈的生日、忌日等重要日子上网追思。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亲自赶到现场凭吊的烈士战友、亲属,以及景仰烈士精神的追随者,可以在网络提供的虚拟空间抒发对红岩英烈的深切怀念之情。网络祭奠虚拟空间突破了时空的阻隔,实现了全天候、全球化的缅怀和祭扫,为人们抒发怀念之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

网络展览可以满足无法到现场实地参观展览的受众需求,扩大了展览的传播范围。红岩联线网站利用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举办“红岩情”、“记忆重庆”等网络展览,使受众足不出户,即可感受这些展览的文化魅力。“红岩情”网络展览模拟现实展览空间,呈现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网上解说区延伸了展览信息,优美的《红梅赞》旋律为虚拟的展览空间营造了氛围。随着鼠标的点击,受众可以自由进入“红岩情”展览区域,获取历史知识,在互动平台进行历史交流。

三、媒体传播在红岩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一)为红岩文化发展推波助澜

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而

且是社会文化的催化剂。在红岩文化发展走过的60年历程中,媒体传播构成了红岩文化发展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促进了红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在几次重要的红岩文化活动时期,媒体的文化参与,对红岩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重庆解放初期发起的纪念大屠杀殉难者的活动中,报纸媒体发挥了重要而突出的作用。重庆报纸对大屠杀惨案的新闻价值和政治意义反应迅速,在最后一次大屠杀发生后的次日从集中营现场发回新闻报道,让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传遍山城,并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在随后的二个月中,媒体持续不断地对大屠杀惨案作追踪报道,组织脱险者和其他知情人“讲述”屠杀事件,发表新闻评论。广大群众通过报纸这个畅通的信息渠道,知晓了大屠杀惨案,认识了为新中国而牺牲的这群英雄。他们不仅自发前去大屠杀现场悼念英雄们,还积极参加追悼会、游行、展览会、座谈会等纪念活动。重庆解放初期的纪念大屠杀殉难者的活动,之所以开展得轰轰烈烈,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在20世纪60年代的“《红岩》热”活动中,全国各大报纸媒体配合阅读热潮,发起评《红岩》活动,组织了一系列专家的解读文章和“普通读者(其实是次一级别的专家)的‘读后感’”^[20]。这些文章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读出”文本与社会主流话语一致的思想意义。“在对《红岩》的各种评价中,‘教材’、‘教科书’是一种普遍的说法”^[20]。媒体的评论活动,使《红岩》的“精神堡垒”的意义“植入”了读者大脑,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红岩》,促进了《红岩》文本宣教功能的发挥,为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推波助澜。1996年,“红岩魂”展览在京引起轰动,全国各主流媒体竞相报道展览盛况。媒体抓住展览的时代意义大做文章,深度剖析红岩英雄们的生存价值观,英雄们用生命写下的“狱中八条意见”,成为媒体解读“红岩魂”展览时引用最多的核心内容。媒体传播使“红岩魂”展览获得极高的知名度,为该展览积累了美誉度和人气指数,为“红岩魂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影响受众的观念世界

媒体传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它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媒体配合政治社会的需要,突出红岩文化的革命性和阶级性特征,引导公众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媒体对小说《红岩》塑造的光彩照人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尤其关注,这

一点从媒体组织的大量相关信息报道和专题解读中可见一斑。媒体希望读者按照其表述的看法和观点阅读《红岩》文本,使这部小说获得更加理想的传播效果。1963年第6期《文艺评论》发表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指出“《红岩》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革命心弦,激起了他们参与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上的更大干劲,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一种战斗的力量”^[21]。按照惯例,这篇文章是经过媒体“把关人”的过滤和筛选的,文章对《红岩》阅读效应的评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传播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与媒体的宣传意图是吻合的。就产生这种阅读效应来说,媒体之前所进行的大量阐释起到了很好的铺垫,发挥了较强的宣传册的作用。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社会的主题由“革命”转向“改革”。经济多元和文化多元时代取代了当年单纯的“政治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对于是否还需要崇高信仰,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感到迷惘,此时的媒体所试图通过传播红岩文化反馈给读者的也正是这类信息。对于1996年“红岩魂”展览引发的火爆全国的“红岩魂现象”,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红岩文化蕴涵的光辉人性和生存观念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意义。媒体对报道方向的定位符合社会需求,满足了读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做什么”和“怎么做”的精神需求。媒体的舆论影响和重塑受众的观念世界,引导读者理性分析新时期掀起的“红岩热”的意义和价值。

(三) 增强红岩文化发展的活力

传统媒体的传播路径是传播者向受传者的单向传播,网络媒体实现了传受的双向互动交流,这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之一。网络传播是对“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的解构,传播者和受众处于平等的地位,互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受众不仅可以“聆听”传播者的讲述,还可以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思想、观点和认识通过网络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加以传播。

网络的开放式结构和海量存储能力为各种讯息意见的进入与碰撞提供了包容空间。比如在博客空间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编辑和发布自己的信息和作品,与网友“面对面”地交谈。在新浪博客上搜索“红岩”,数据支持510余万条^⑩。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红岩”成为博客空间的热点话题。红岩英雄的

气质和风骨像一股暖流,激荡着博客们的心灵,他们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记录对红岩英雄们的特殊情感,解读红岩英雄们的生存观念,表达对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深层思考。在博客空间,访问者与传播主体之间可以“面对面地”交流,诚实、直率地表达对红岩的情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而是意味着他们忠于自己的观点和假设”^[28]。由于这种新的传播范式避开了官方的话语磁场,摆脱了“把关人”的话语控制,传达的是个人视角下的“红岩”,使到访者消除了距离感,给他们带来了亲切感和真实感,更容易获得信任和认同。

在网络空间,每一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网络媒体消解了红岩文化传播的官方话语霸权性质,红岩文化传播不再只是官方话语的单向输入式传播,网络为普通大众提供了话语平台,他们可以如实地表达自己对红岩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的互动交流中,探讨红岩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网络媒体使文化传播发生了质的飞跃,“打破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界线,是典型的平行传播的模式”^[1]。文化传播开始带有“平民化”色彩,使传播更具感召力和生命力。网络传播提供了一个开放、互动的场域,为红岩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野,使其文化阐释和传播形式有新的发展和突破,有利于增强红岩文化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 [1] 庄晓东. 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4,155.
- [2] 钱振文.“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J]. 渤海大学学报,2008(4):35.
- [3] 国特屠杀“政治犯”惨景[N]. 国民公报,1949-12-2.
- [4] 国民党匪帮大屠场尸横遍野令人发指[N]. 新蜀报,1949-12-2.
- [5] 吊“政治犯”屠场[N]. 新民报日报,1949-12-3.
- [6] 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N]. 大公报,1949-12-3.
- [7] “一一·二七”大屠杀数百志士死在匪帮毒手[N]. 新华日报,1949-12-12.
- [8] 任可风. 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磁器口大屠杀[N]. 大公报,1949-12-6.
- [9] 王国源. 逃出白公馆[N]. 新民报日报(重庆版),1950-1-21至1950-1-30.
- [10] 钟林. 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N]. 国民公报,1949-12-

⑩2010年8月12日搜索结果。

- 291950-1-1.
- [11] 敬悼死难的爱国“政治犯”[N]. 新蜀报, 1949-12-2.
- [12] 磁器口大血案[N]. 大公报, 1949-12-3.
- [13] 血债要用血还[N]. 国民公报, 1949-12-4.
- [14] 化悲痛为力量[N]. 新华日报, 1949-12-15.
- [15] 山莓. 那歌声还在燃烧[N]. 国民公报, 1949-12-26.
- [16][17] 杨禾. 供奉[N]. 国民公报, 1949-12-26.
- [18] 顾工. 安息吧! 被难的战友[N]. 新华日报, 1950-1-15.
- [19] 罗荪. 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N]. 文艺报, 1962(3).
- [20] 钱振文. 《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J]. 文艺争鸣, 2007(12):142, 143.
- [21] 朱寨. 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J]. 文学评论, 1963(6):64.
- [22] 上海人民电台编排新节目[N]. 文汇报, 1962-7-27.
- [23] 播讲“读《红岩》忆亲人”[N]. 四川日报, 1963-11-9.
- [24] 赖浩锋. 互联网背景下的受众分化与个人传[EB/OL].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3241404.html>.
- [25] 关于叛徒的话题[EB/OL]. <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1163&page=1>.
- [26] 廖述务. “探索者之夜”:本科生读《红岩》[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32-35.
- [27] 张颐武. 网络媒体如何传播“文化”[EB/OL]. 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wtjj/xz/z/8718_5.shtml.
- [28] 刘津. 博客传播[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104.

Hongy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Transmitting

XU K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search, Chongqing Hongyan

Revolution History Museum, Chongqing 400043,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nsmitting of Hongyan Cultur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traditional media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power of itself, focuses on the event of carnage, provides a presenting platform for the works about Hongyan, record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activities of Hongyan Culture, guid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it. The network media actively creates and transmits the electrical landscapes of Hongyan culture, gathers abundant information resource, builds the intercommunicating space, releasing the huge energy of its transmission. Hongyan Culture is a focus of media. And media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e, influencing and rebuilding the idea world of the public, strengthening the vigor of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Hongyan culture; traditional media; network media

(责任编辑 彭建国)